

# 目 錄

FOREWORD .....	Paul L. Swanson
序言.....	保羅·L. 史萬森
一、疑偽經與漢語史研究 .....	1
從名古屋七寺的兩部古逸經資料探討疑偽經在漢語史 研究中的作用 .....	3
《清淨法行經》語詞考辨 .....	36
試釋《佛說安墓經》 .....	51
二、佛經音義研究—以日本現存古寫本佛經音義資料為 中心 .....	65
日本現存佛經音義及其史料價值 .....	67
《孔雀經單字》漢字研究 .....	91
《四分律音義》俗字拾碎 .....	123
《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與《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 之詞彙比較研究 .....	151
日本古寫本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 .....	172
從佛經音義的“同義為訓”考察同義複合詞的發展 .....	204

從佛經音義的辨識看外來詞的漢化過程 .....	229
佛經音義與漢語雙音化研究 .....	248
三、中近世日僧漢語論著研究 .....	277
試論無著道忠對近代漢語虛詞研究的貢獻 .....	279
靈雨除病——讀無著道忠《怨雲靈雨》 .....	299
“句雙紙(禪林句集)”與日本近代禪學 .....	322
日本中世禪語辭書與漢語熟語研究 .....	347
四、近代漢語語法(三音節)研究 .....	367
近代漢語後綴“子”考察之一——“子”附於量詞後 .....	369
試論近代漢語中的三音節“子”尾詞 .....	388
論近代漢語中三音節副詞 .....	418
五、其他——佛教文化 .....	445
從漢語對佛教譬喻的取捨看比喻的民族差異 .....	447
從“泰山地獄”到“東嶽主冥”的泰山信仰 .....	471
後記 .....	486

## FOREWORD

I remember quite clearly the first time I met Dr. Liang Xiaohong, at the Nagoya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Japan in May 1993, greeting her arrival from Beijing as an eager young researcher. Arrangements had been made for her to spend time at the Nanzan Institute for Religion and Culture, Nanzan University, for the mutual benefit of our research in Buddhist Studies, and as a promising scholar capable of bridging the academic studies of China and Japan. Since then she has kept up a constant affiliation with the Nanzan Institute, first as a visiting researcher, and then as an affiliate Research Fellow. She joined the Nanzan University faculty full time in the spring of 2001, and was promoted to full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Policy Studies in 2004. She continues to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nzan Institute research family, and it is an honor and pleasure for me to compose this short introduction to her latest (of many) publications.

Dr. Liang has now spent almost 15 years in Japan, and has

proven to be an important bridge-builder and contributor to the study of Buddhism in Japan and China. The essays collected in this volume were all written after her arrival in Japan, and represent only a small part of her prodigious production. Allow me to briefly outline some of the eclectic topics:

1.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so-called “spurious” or “counterfeit” Buddhist texts (scriptural texts that were purported at one time to be a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from an Indic language, but were actually composed in China), and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Buddhist terminology.

2. Analytical studies on the sound gloss of classical Chinese based chiefly on the sources extant in Japan and on the “vulgar” (as opposed to the “orthodox”) characters found in the sound glosses in the hand-copy editions by the Japanese monks of some individual Buddhist scriptures. (Usually the sound glosses are found in plural, rather than single, Buddhist scriptures.)

3. Studie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Japanese Buddhist monks in the medieval and post-medieval periods, as represented best by Mujaku Dōchū (無著道忠, 1653—1744), as well as other Zen Buddhist monks.

4.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medieval Chinese language, concentrating chiefly on the tri-syllabic words that are formed by adding the suffix *-x* (子), such as in the tri-syllabic adverbs and measure word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se words is presented.

5. Cultural studies on Buddhist metaphors and other culturally significant expressions related to Buddhism.

This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Dr. Liang also contains a study of

## FOREWORD

the *Zenrin kushū* (《禪林句集》), a Japanes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hrases and sayings that were (and still are) used in the training of many Zen Buddhist monks. Dr. Liang provided valuable help and advice to Dr. Victor Sōgen Hori when he was at the Nanzan Institute preparing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valuable work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Zen Sand: The Book of Capping Phrases for Kōan Practice*, 2003).

On a personal level, Dr. Liang and I have collaborated closely on a number of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a study of the term *pi-kuan* (壁觀)—the famous “wall contemplation” of Bodhidharma—as a “mixed binome” (梵漢合成語), and a review article on a new Chinese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Japanese of Dōgen’s *Shōbōgenzō* (道元《正法眼藏》).

I am honored that this exciting collection of essays will be published by the same Press that produce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y edited collection on *Pruning the Bodhi Tree* (《修剪菩提樹：批判佛教的風暴》, 2004). I believe that this collection will contribute much to Dr. Liang’s continuing role as a bridge between scholarship on Buddhism in Japan and China.

Paul L. Swanson  
Director, Nanzan Institute for Religion and Culture  
Professor, Nanzan University

# 序 言

我依然清晰地記得 1993 年 5 月在名古屋國際機場第一次見到梁曉虹博士時的情景，她來自北京，是一位充滿熱情的年輕學者。我們希望她在南山大學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做一些溝通中日學術交流的工作，並在佛教學術研究方面有所作為。從此，她便與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結下了不解之緣，先是作為訪問學者，後來又擔任兼職研究員。2001 年她成為南山大學的專任教員，2004 年又被提升為綜合政策學部的教授。她一直是我們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這個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員，著述甚豐。在此，我能為她的最新著作作此短序，深感榮幸。

梁曉虹博士在日本已經度過了十五個春秋，她不負眾望，為日中佛學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書所收論文均為其來日後所撰，只是她多產的著述中的一部分。筆者不揣冒昧，將本書所涉主題簡述如下：

1. 對所謂的“疑經”或“偽經”（即一度被認為是某一時期譯自印度某一語言，而實際是在中土編撰而成的佛經），以及特別是與佛教用語有關的漢語史進行的比較研究。

2. 主要根據日本現存的資料，對古漢語音義，以及日本僧人所撰述的一些單經寫本音義中出現的“俗”字（與“正”字相對）所進行的分析研究。（一般說來，佛經音義資料多為衆經音義，而單經音義則少見。）

3. 對中世和近世日本禪僧——尤以無著道忠（1653—1744）為代表，亦包括其他一些禪僧的漢語論著所進行的研究。

4. 對近代漢語語法，主要是通過附加後綴“子”而形成的三音節現象，如三音節副詞和量詞所進行的研究。有關這些詞的詳盡分析見正文。

5. 對佛教的比喻以及其他與佛教有關的重要文化術語所進行的文化研究。

梁博士的這本論文集還收錄了一篇討論“禪林句集”的文章。“禪林句集”為日本僧人編寫，是一種過去（現在依然）用於培養禪僧的匯聚漢語語彙、熟語的句集。在 Victor Sōgen Hori 博士於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完成其英文著作 *Zen Sand: The Book of Capping Phrases for Kōan Practice*（2003 年出版）期間，梁博士為其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幫助和建議。

就個人而言，我與梁博士共同合作了幾項研究課題，其中包括梵漢合成語“壁觀”（即著名的菩提達摩“面壁而思”）的研究和對一篇譯著（即將日本道元的《正法眼藏》譯成現代漢語）的評論文章。

這本令人振奮的論文集，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此社與出版由我編輯的 *Pruning the Bodhi Tree* 的中文版《修剪菩提樹：批判佛教》的風暴》（2004）的是同一家出版社。對此，我深感榮幸。我相信本書乃是梁博士在溝通日中佛學研究方面所作的又一貢獻。

保羅·L. 史萬森  
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  
南山大學教授

# 一、疑偽經與漢語史研究

# 從名古屋七寺的兩部古逸經資料探討 疑偽經在漢語史研究中的作用<sup>①</sup>

## 一、從疑偽經的特點考察疑偽經與漢語史研究的關係

### (一)

自東晉名僧道安提出疑偽經問題後，正統的經錄編撰者就又承擔起了一項特殊的使命，即辨別疑偽經，並錄疑經和偽經以示衆，為防後人不明底細而將其編入大藏。從他們對疑偽經的認識以及辨別標準，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疑偽經的特點。

道安最早在其《綜理衆經目錄》專設《疑經錄》，共 26 部 30 卷<sup>②</sup>，並在序言中解釋其原由：“外國僧法，學皆跪而口受。同師所受，若十、二十轉，以授後學。若有一字異者，共相推校，得便擯之，僧法無縱也。經至晉土，其年未遠，而喜事者以沙標金，斌斌如也，而無括正，何以別真偽乎！農者禾草俱在，后稷為之嘆息；金匱玉石同緘，卞和為之懷耻。安敢預學次，見涇渭雜流，龍蛇並進，豈不耻之！今

列意謂非佛經者如左，以示將來學士，共知鄙信焉。”<sup>③</sup>

南朝齊梁時著名佛教史學家僧祐不僅在其《出三藏記集》中列出了道安所出的全部疑經，而且又撰《新集疑經偽撰雜錄第三》，列出疑經 12 部 13 卷，偽經 8 部 13 卷，並作序言：“《長阿含經》云：‘佛將涅槃，為比丘說四大教法。若聞法律，當於諸經典推其虛實，與法相違則非佛說。’又《大涅槃經》云：‘我滅度後，諸比丘輩抄造經典，令法淡薄。’種智所照，驗於今矣。自像運澆季，浮競者多，或憑真以構偽，或飾虛以亂實。……祐校閱群經，廣集同異，約以經律，頗見所疑。夫真經體趣融然深遠，假託之文辭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也。今區別所疑，注之於錄，並近世妄撰，亦標於末。並依倚雜經而自製名題，進不聞遠適外域，退不見承譯西賓，‘我聞’興於戶牖，印可出於胸懷，誑誤後學，良足寒心。既躬所見聞，寧敢默已。嗚呼來葉，慎而察焉。”<sup>④</sup>

從以上可以看出，道安和僧祐均認為：真經源自佛陀以來的世代傳授，自然是來自印度，即使是輾轉來自西域，其義理也一定與佛經不相違背。而所謂疑偽經，乃後人假託佛之名義而偽造，或“抄造經典”，或據部分佛教義理而攙雜進虛構的成分，或完全出自編造者的胸臆<sup>⑤</sup>。故而從內容來看，則“義理乖背”<sup>⑥</sup>；從文風著眼，則“文偈淺鄙”<sup>⑦</sup>；從來源考察，則非來自西天——“外域”，故自然亦無真正的譯者。他們為這類經編纂目錄之目的正是“以示將來學士”，識別真偽，擯除疑偽者，防止其流行。

僧祐之後，又有一些佛教史學家著有關於疑偽經的記錄，但這些經錄現已不存，無從考察，而且從現存的這些經錄的目錄及隋代幾個經錄的情況來看，它們對疑偽經的研究，似乎均未超過《祐錄》<sup>⑧</sup>。

隋唐時期，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各大宗派的紛紛創立，加快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佛教中國化的結果奠定了佛教在東方發展的歷

史里程碑。有意思的是，儘管道安、僧祐等人深以疑偽經為耻，叮嚀“後學”要“慎而察焉”，然疑偽經却有增無減，逐漸增多。隋開皇十四年法經等人奉敕完成的《衆經目錄》卷二共著錄疑偽經 197 部；仁壽年間的《衆經目錄》卷四《疑偽》則錄目疑偽經 209 部 491 卷；至唐代智昇的《開元釋教錄》，數目已增至 406 部 1074 卷。當然，人們對疑偽經的認識亦隨之加深，研究水平也在《祐錄》的基礎上有所提高。最重要的就是將“偽經”和“疑經”作了區別劃分。《法經錄》卷二分設《衆經疑惑》和《衆經偽妄》。法經區分的基準為：疑經者，“多以題注參差衆錄致惑，文理複雜，真偽未分，事須更詳，且附疑錄”。而偽經者，“並號乖真，或首掠金言，此未申謠讖；或初論世術，而後託法詞；或引陰陽吉凶，或明神鬼禍福。諸如此比，偽妄灼然。今宜祕寢，以救世患”<sup>⑨</sup>。智昇論“偽經”則道：“偽經者，邪見所造，以亂真經者也。自大師韜影向二千年，魔教競興，正法衰損，自有頑愚之輩，惡見迷心，偽造諸經，誑惑流俗，邪言亂正，可不哀哉！”<sup>⑩</sup>論“疑經”則曰：“自梵經東闡，年將七百，教有興廢，時復遷移，先後翻傳，卷將萬計，部帙既廣，尋閱難周，定錄之人，隨聞便上，而不細尋宗旨，理或疑焉。”<sup>⑪</sup>

從以上我們不難看出：首先，中國的佛教學者對疑偽經的認識也是隨着佛教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道安是中國佛教史上最早的系統經錄編纂者，其《綜理衆經目錄》對後世影響很大，為中國佛教目錄學奠定了基礎。道安編纂經錄的“緣起”，正是因為見到當時雖然譯經數量日漸增多，但譯經質量參差不齊，失譯現象亦多見，又有“偽經”出現。然而，道安並未能對“偽經”和“疑經”作出明確的判斷，對產生疑偽經的原因和背景也未能作出正確的解釋。道安以後，各種經錄多有出現，對於疑偽經的研究也逐漸深入，不僅把偽經與疑經作了區分，還提出了鑒別的方法。其次，所有經錄的編纂者們對疑偽經的研究都是從正本清源的立場出發的，他們判

定“偽經”的基準就是看它是否為翻譯的佛經，如果是否定的，那就一定是“非佛所說者”，屬於“偽妄”；而對來歷難以確認有疑問者，則歸之於“疑惑”，屬於“疑經”。因為是出於批判的角度，所以大多言詞激烈，語氣嚴厲。他們還考察經典的文字和文風，認為疑偽經在語言文字上均有“淺鄙”、“淺雜”之跡。而進行這些鑒別的目的正是為了去疑存信，去偽存真。據道宣的《大唐內典錄》卷十記載，隋開皇年間就曾焚除疑偽經五百多卷<sup>⑫</sup>。而隋唐的經錄幾乎全是奉敕而造的，這就更增添了其權威性，也就等於向疑偽經下了判決書。特別是自隋代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首次出現《入藏錄》後，即著錄應收入《大藏經》的經典，這些經典自然首先受到保護，其流通暢通無阻。相反，被判定為偽經和疑經的，就被擯出《大藏經》之外，不許入藏，而且禁止流通，甚至被銷毀。這樣，就使得大量的疑偽經得不到被保存及整理的機會。更因為自《開元釋教錄》以來，經過智昇收集並考證，最後編定的《入藏錄》兩卷廣為流傳；而且“會昌廢佛”以後，大家都以《開元錄·入藏錄》為標準目錄來檢查本地佛經，斥偽補缺，以致使其成為全國性的標準目錄。晚唐五代全國各地寫造《大藏經》，幾乎也都依據此《入藏錄》。後來的刻本藏經，亦均以此《入藏錄》為基礎來修造<sup>⑬</sup>，這也就意味着《開元錄》以後出現的疑偽經也就沒有機會進入大藏經了。

## (二)

古代中國僧人在幾百年間發展起來的關於疑偽經的傳統理論對後人影響較大，特別是對如何鑒別疑偽經具有一定的參考作用。然而，因受時代的限制以及對印度佛教的盲目崇拜，古代傳統佛教學者對疑偽經的認識還有局限，其研究出發點和目的也還有偏差。所以，今天我們應該對疑偽經作出一個正確的判斷，對它們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所起的作用進行重新再認識。這種“再認識”，不僅對

佛學、史學、文獻學等研究領域很重要，而且對漢語史研究領域也極有幫助。

### 1. 西天所來者，並非均為真經

中國佛教來自印度，佛經之源在“西天”。雖然佛祖述而不作，但最終還是要歸結到釋迦牟尼那裏，其弟子通過結集的形式，將其言行追記下來，才形成了最初的經——“Sūtra”。然而，當時還沒有形成文字，而是采取口口相傳的傳統。而且，各地教團都用其所在地的俗語來傳承佛典，沒有統一的標準語。這樣，在佛教向各地傳播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各種理解的歧異與傳承的訛誤，甚至產生各種人為的篡改，這也是佛教後來分裂成許多部派的原因之一。<sup>⑭</sup>

雖然佛教史上記載佛經結集有四次，但是人們一般認為只有第一次阿難誦出的釋迦對佛教教義的種種說教，即大體後來成書的《阿含經》，以及優波離分八十次背誦出來的佛陀規定的有關出家人修持和生活的種種規範的《八十誦律》，才屬於真正“為佛所說”。因而後來東漸來華的傳教者以及西去佛國的取經人跋涉千山萬水而携來的卷帙浩繁的佛經，有相當的部分可能為“非佛說”者，而是假借佛之名義而出現的所謂“疑偽經”。印度佛教發展到鼎盛之際，各宗各派都各自傳習本宗派的經典，特別是那些篇幅宏大、描寫浪漫、語言綺麗的大乘經典，距“佛所說”就遠之甚遠，雖然這些經典也都以“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佛說……”等開始，但非“佛說”的原話、本意，難免稱性發揮，甚至肆意篡改。當然，如果從印度佛教的整體來觀察的話，無論是小乘經典還是大乘經典，也無論是“為佛所說”還是“非佛說”者，它們同是印度佛教文化的精髓，體現了印度佛教從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又向大乘佛教的歷史發展歷程。然而，如果從比較嚴格的意義上來考察印度佛教的發展和佛典關係的話，我們可以發現，歷史上的印度

佛教並不統一，所以儘管早期有關佛典有所謂“九部經”<sup>⑮</sup>，後來又出現“十二部經”<sup>⑯</sup>，再後來又發展為經、律、論“三藏”的分類，但是，終結印度佛教一千多年的歷史，並沒有出現一部統一的大藏經。所以，古代中國僧人認為凡是從印度（包括中亞一帶）傳入的佛經均為“真經”，全部可信，這是非常片面的。

## 2. 疑偽經是佛教中國化的特定產物

中國長時期內以儒家思想為正統，甚至當佛教傳進來以後，佛教徒們也受其影響，首先他們用“經”來對譯“Sūtra(修多羅)”這個詞。梵語“Sūtra”，巴利語“Sutta”的本意指用線與紐串聯花簇，所以漢語中“Sūtra”還有一個直譯是“經”。之所以後來通行用“經”，一是因為“經”有貫穿的意思，人們認為佛經就是把佛的各種說教貫穿起來，所以稱“佛經”；而更重要的是，信徒們聯繫到儒家有五經，而五經的地位被儒家奉為日常所奉行的法則和義理，如此佛祖釋迦之言自然也應被奉為永恆的真理、根本的法則，所以應稱“佛經”。正如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七《妙法蓮華經序品音義》所釋：“經，貫穿也，攝也。《玉篇》云：久也，常也，經營歸求也。經，里數也，法也，理也，度也。”<sup>⑰</sup>亦如隋智顛《法華玄義》卷八解“Sūtra”曰：“此間聖說為經，賢說為子、史；彼聖稱經，菩薩稱論。既不可翻，宜以此代彼，故稱經也。”<sup>⑱</sup>從此可看出兩點：其一，中國佛教信徒對從印度傳來的佛經極為虔信；其二，佛經初傳來就已經打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

就在正統的佛教徒們虔誠地把“Sūtra”奉稱為“經”，並且熱心地將大批“Sūtra”譯成漢語的同時，而另外一些人，即道安所說的“喜事者”却開始撰述“佛經”，即所謂的“偽經”了。而且，儘管被判為“偽妄”和“疑惑”，遭遇打入冷宮、禁絕流通，甚至銷毀的命運，但幾百年間疑偽經現象却没有消失，相反可以說隨着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而愈加顯著，從歷代經錄的記載以及敦煌等地出土的疑偽經資

料，人們可以很清楚地明了這一點。

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現象，有以下兩點重要原因：

(1) 記錄和詮釋逐漸發展的中國化佛教

佛教是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東漸來華的。中國佛教保存了印度佛教的精神本質，但又有別於印度佛教。佛教自從進入華夏大地起，就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接觸，開始了一個試探、依附、衝突、改變、融合<sup>①9</sup>，並深深地滲透進中國傳統文化的漫長過程。這一過程的最終結果是形成了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國佛教。也正是在此過程中，出現了“喜事者”撰寫“佛經”的現象。日本牧田諦亮博士在其《疑經研究》中指出，疑經從內容上可分六類：1)迎合統治者之意願者；2)對統治者之施政進行批判者；3)思考與中國傳統思想的調和及其利弊者；4)鼓吹特定的教義信仰者；5)標榜當時特定的個人之名者；6)單為治病迎福等目的而寫的迷信類<sup>②0</sup>。這正是中國佛教發展歷程的真實紀錄。從這個意義上講，偽經雖“偽”而不失為寶貴的資料。以上六大類，既不屬於釋迦佛祖當年對弟子們苦口婆心講述的經律範圍，也不是各部各派詮釋教義所產生的論部大作，它們反映的是中國佛教的思想，體現的是佛教中國化進程中的許多片斷，正如另一位日本學者望月信亨所指出的那樣：疑偽經是佛教在中國與儒、道兩家相互衝突、但又不斷調和並相互滲透的結果<sup>②1</sup>。但是因為長期以來傳統的“真經”的概念非常強烈，所以只能假託佛說，以求獲得能存在的一席之地。這些中國僧人撰述的佛經，它們與逐漸發展着的中國化佛教密切相關，對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2) 擴展壯大中國佛教之需

佛教雖然因為大量的佛經被翻譯而進入中國，然而它畢竟原本屬於一個完全不同質素的文化系統。儘管譯經者們在翻譯的過程中已經盡可能地作了很多工作，然而那西天的佛國、西方的淨土，總

讓人感覺距離遙遠。佛教中國化，是為了爭取廣大民衆，當然需要適合中國信徒的“經”。於是有些“喜事者”就開始或為闡明佛教的要旨而抄略經文，或為了有助於教化而在經文中夾雜進世俗信仰<sup>②</sup>，如《新菩薩經》、《救諸衆生一切苦難經》就反映了中國佛教俗信化的一個側面<sup>③</sup>；又如《高王觀世音經》與觀世音信仰有關，《十王經》則跟地獄觀念相關聯；有的甚至在經中加上許多中國人熟悉的天子、國王以及神人、道人之類的人物，揉雜進很多却災得福、延年益壽以及風調雨順、皇祚久長的內容和思想，以使更多的中國民衆能夠接受，如《毗羅三昧經》<sup>④</sup>。另外，為了使經文內容通俗易懂，造經者在語言文字上多用俗言口語。疑偽經的撰述者不僅具備佛教知識，而且擁有種種傳統思想，而為了使一般民衆更容易理解佛教，造經時常常將當時的口語大幅度導入經典之中<sup>⑤</sup>。所以，應該說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語言文字，疑偽經都與當時的中國民衆更為接近。這可以看作是佛教在中國發展過程中為了贏得更多的信徒和擴展宣傳範圍的實際需要。這也正是疑偽經現象屢禁不止，雖不能入藏但却流入民間的重要原因。

產生疑偽經的原因有多種，其中當然不乏確實有“喜事者”因迷信、好奇而產生的偽妄之作。另外，疑偽經亦並非一定是中國人撰寫，也有日本僧人所著述，甚至還有從印度傳來的。但或因不是在正規譯場中譯出，或因譯者文化水平不高，以致被歸入疑偽經，如《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sup>⑥</sup>。但是，無論何種原因產生的疑偽經，一般來說，都具有語言通俗、“文偈淺鄙”的特色，“因此，對研究中古漢語語法、詞法也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這已屬於漢語史研究”<sup>⑦</sup>。所以，重視這一部分“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是佛教學界向語言學界提出的倡議，也自然應該是語言學界義不容辭的職責。

## 二、從“七寺寫本一切經”看疑偽經在漢語史研究中的資料價值

寫經歷史悠久，從印度到中國，從中國又到朝鮮、日本。材料則從貝多羅葉、素帛、竹木、紙張，到石材、金銅薄片等。總之，是用各種語言把佛典書寫下來，以利流傳。應該說，在印刷術尚未發達之時，寫經對於佛教弘傳流通的功用是顯而易見的。中國自東漢開始翻譯佛經以來，就有筆寫之經典，後來或因請經，或為流佈，寫經之風極盛，隋唐之世，更為普遍。

日本從奈良時代就出現寫經，基本是模仿中國的方式，除官設寫經所外，尚有寺院、貴族之寫經所。而且隨着佛教在日本的發展，寫經之業在平安時代臻於鼎盛，鎌倉以後才逐漸衰微。因此，寫經是日本佛教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從而有“寫經”、“寫本藏經”、“寫本一切經”一類的名稱，與“刻經”、“刻本藏經”、“刻本一切經”以及“印本一切經”並立<sup>⑳</sup>。

落合俊典與方廣錫《寫本一切經的資料價值》從三個方面論述了“寫本一切經”作為研究資料的重要價值：(1)有刻本所沒有的字句與文字，保留了該經典更古老的形態，是編纂刻本時刪除或改竄前的原本。(2)存有異本，其中最大的異本應為“不入藏錄”所收的大量經典。(3)“不入藏錄”中的疑偽經大多是極其重要的資料，那是一個新文獻的寶庫<sup>㉑</sup>。

本文研究的資料是日本名古屋七寺“寫本一切經”中的兩部疑偽經。

名古屋七寺位於名古屋市中區，為真言宗之名刹古寺。此寺正式名為稻園山正覺院長福寺。奈良天平七年(735)，行基菩薩於當